

谁

妨碍我们更加
富有

李彤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谁

妨碍我们更加

富有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妨碍我们更加富有 / 李彤著. —北京 :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121-12905-6

I. ①谁… II. ①李… III.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9171号

谁妨碍我们更加富有

李彤 著

策划编辑: 韩 龙 btseven@126.com

责任编辑: 李 影 文字编辑: 韩 龙

特约编辑: 方 凡

印 刷: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20千字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CONTENTS 目录

谁妨碍我们更加富有

序言 制度是因也是果 001

第一章 谁妨碍我们更加富有 023

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制度和性格。制度瓶颈包括不公正的国际环境和低效率的国内资源配置方式。性格阻碍则是几千年环境造就的那些“劣性”。

第一节 财富的源泉在哪里 / 025

第二节 钱、资本和财富 / 037

第三节 当蛋糕不再做大的时候 / 050

第四节 国有资产是政府对民众的信托责任 / 064

第五节 别让民企“生的卑微、死的惨烈” / 074

第六节 中国，经济学家的迷惑 / 084

第七节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 092

第二章 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力 103

不管企业在客观上为社会提供了多少产品和服务，在表面上显得如何重视“社会责任”，它在主观上是为股东（资本家）谋利益的。股东凭着“剩余索取权”拿走“剩余价值”合理吗？股权激励、对赌的本质是什么？最后，儒家思想能够解读今天的企业吗？

第一节 企业的利润从何而来 / 105

第二节 企业上市后的死水微澜 / 119

第三节 风险投资有时是饮鸩止渴 / 127

第四节 对现代企业何为仁义 / 135

第五节 治理企业的“中医疗法” / 144

第三章 未来系于“中产” 153

让中国诞生数以亿计的中产者是支撑社会走向繁荣、富强、民主的唯一路径。带着贫穷标签的工人、农民曾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先进力量”，今天领跑的应当是追求国家富强、社会繁荣稳定、个人生活幸福的中产阶层。最后，对个人来讲通过股市、房市、黄金的投资理财开展得越早越好。

第一节 中产阶层的社会价值 / 155

第二节 别让股市成为掠夺财富的工具 / 165

第三节 为什么要把财富换成砖头瓦块 / 172

第四节 使财富暴涨的“险路” / 184

第四章 谁说中国会统治世界 / 193

改革开放仅三十年，中国迅速走完了先行国家耗时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创造财富的速度令世人目眩。这一切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会统治世界吗？

- 第一节 中国曾经有多先进 / 195
- 第二节 新帝国主义致命的自负 / 208
- 第三节 人民币不可能替代美元 / 216
- 第四节 中国会统治世界吗 / 223

序言 制度是因也是果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是因为金融不发达吗？中国人自古就缺少科学精神吗？清教精神与“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令人不安的是普通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的份额越来越少，“富有”二字似乎越来越远。“奴”和“被”这两个字倒是成为不少人的写照，“被代表”、“被平均”的“房奴”、“卡奴”、“孩奴”们的怨气可想而知。更令人不安的是，连成为某种“奴”都求之不得者的戾气在虚拟与现实的空间里积聚、徘徊……

为今之计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分析问题求得共识，中策是尽量“维稳”推迟崩盘，下策是“砸烂一切”。本书就是探求共识之作。

中国的自然条件适于农耕文明，该文明可以承载大量的人口，并提供相对安逸的生活，但需要“大政府”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所以，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都没有跳出王朝更迭的“死循环”，直到被足以亡国灭种的外力打破。在自然条件迥异的欧洲，君王只能与教会“狼狈为奸”分享权力。神权统治的极度严酷和贪得无厌，招致“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面清算。其后，被改头换面的“新教”又成为新兴工商势力反抗君权的精神武器。

1840年以来的经历不堪回首，今天中华民族早已远离“最危急的时刻”并且日益强大、富裕了起来，但落后挨打的根源没有找到总是让人不安。中国为什么从绝对领先变为极度落后？古老的文化传统能支持中华民族从追赶者变为领跑者吗？更直白地说，是不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中潜藏着某种不治之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神速进步是否已经无法延续？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不是难以甩掉的包袱？

谁说中国人缺乏自省意识，谁说我们保守固执，一百五十年来国人从没有停止过反思并且勇于试错，流血漂杵也在所不惜，只要能中国富强，虽九死而不悔。康有为的改良之路不通，孙中山率众终结了千年帝制；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数千万生命换来民主建国；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我们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厄运；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制造冠绝全球……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不过一百七十年，只相当于清朝寿命的一半，与夏、商、周跨越的时间更是无法相比。尽管代价惨痛，我们还是应为一百多年来的进步感到欣慰。

一百多年来，聪明好学的中国人一直在寻找导师。日本维新、英美立宪、苏俄革命都曾被我们借鉴。改革之初，首批走出国门者肯定深受刺激。在国内，不要说缺衣少食、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的农村，当时的城里人吃块豆腐都要凭票、排队，而且还得等到年节才有供应。文艺作品里的好市长就是让市民吃到豆腐。而美国超市里是什么景象：人高马大的“老外”推着购物车，在商品的海洋里随意抓取，潇洒地刷卡付账，然后开着后备箱塞满货物的私家车驰往带花园的House……“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这样的宣传顿时显得苍白。20世纪80年代，武克钢^①第一次走出国门时去的是新加坡，那里的繁荣、进步让一行人震惊，一致认为“五十年以后中国也没有城市能达到新加坡的水平”。也难怪当年有那么多

^① 武克钢，1952年生于浙江杭州，1980年至1987年担任蛇口特区副区长，1997年兴办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编者注

人舍死忘生、不择手段地争取留在海外。人生苦短呀，改变不了国家就改变自己的命运吧！但也有许多人回来了，他们心中深藏着这样的梦想：让美国的今天成为中国的明天。我们应当感谢他们，三十年后再也不会有国人在美国超市被“洗脑”了，倒是华人在奢侈品店“扫货”的场面可以给洋人“洗头”了。

但是这一代人也有鲜明的历史局限，生长在红旗下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基本来自“批林、批孔”运动，“三纲五常”、“中庸之道”在他们脑海里是一堆“四旧”、破烂货。欧美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令“老海龟”倾倒，成为自由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全盘照搬，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新生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80后、90后）没体验过计划经济、没来得及看世界，是初入经济社会的“菜鸟级”玩家。享受着市场经济果实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是充满矛盾的一代：一面朦胧地羡慕大锅饭、低物价、包分配、分房子，却决不可能忍受领几十元月薪、“排队”到三四十岁才“抢”到筒子楼里的一间房，在楼道里用煤球炉做饭，只能使用公用水房和卫生间……“老海龟”非富即贵，“新生代”人多势众。前者像《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在公众右耳畔不厌其烦地鼓吹自由化、放松管制、国际惯例，后者则像牛魔王一样在人们的左耳畔吼天骂地。

其实，“老海龟”与“新生代”都是有良知的、爱国的，但缺少的是共识。他们同在一片蓝天下，正如一百五十年前美国的北方和南方，北方人从星空中读到天赋人权的神圣，南方人读到的则是奴隶制的天经地义。

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已在持续一二十年的高增长中被耗尽，只有进一步的变革才能为更加宏伟的大厦构筑起制度的基石。另外，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模仿秀”也已触碰到资源瓶颈，小小的地球承受不了十几亿人过上美式生活。也就是说，中国发展的模式及目

标都需要大幅修正。奥巴马声言美国不做二流国家，中国走模仿之路到头也就是个“小二”，值吗？

下面，让我们从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原因的几种假说开始。

一、落后的金融是原因吗

从技术层面找原因总是相对容易些，最近流行的一种说法将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结于没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代表人物是陈志武教授。封建政府只知一味往国库存钱，明末国库藏银1300万两，乾隆朝鼎盛时期达到7000万两。不仅是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也都大量藏金，而英、法、西、荷、意、美等列强的政府都负债累累。结果却是擅长攒钱的一败涂地，大胆亏空的横行世界……其实，执此观点的金融专家只是说对了现象而没有揭示本质。

几百年前，金银是流通货币。政府大量囤积金银与今天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异曲同工，都是在收紧银根。相反，美英等国政府的国债本质上是有价证券，是可以交易、流通的，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货币的功能，政府的借贷行为反而向实体经济注入了流动性。世界上最早的证券交易所里主要的品种就是国债。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规范的上市公司出现之前，政府是唯一具备足够信誉的证券发行主体。另外，国债持有者只有到期才能拿回本利，如果中途需要用钱就得寻求变现。而资金富裕者也愿意折价购买没有到期的国债，以便从中牟利。所以，当国债发行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自发形成交易市场。有意思的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证券玩家，比如上海的“杨百万”也是从收购“国库券”起步的。

从金融角度来看，中外之间呈现两正两反的对应关系。第一对是清王朝不能像英、美政府那样融到充足的资金来发展经济、增强

武力。这是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第二对是清政府囤积的金银收紧了市场的流动性，而英美的国债却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战败赔款及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造成的巨大财政危机，使通货紧缩更加严重。如果把清王朝覆灭这事儿比喻为一张纸，正面是政治垮台，背面则是经济破产。

陈志武教授摆对了现象：“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民主富强”，但却搞错了因果。如果真的那么简单，清政府只要大力发展金融，到处借钱就能够改变四万万人的命运！更有意思的是，陈志武教授还认为靠借钱度日的政府对民众自然低声下气，国库充实的国家当然不会搞民主。也难怪，金融专家不由自主地把金融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

其实清政府很想发行国债，而且还真的发行了几次。但按照封建礼教“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债的发行者和持有者为主仆关系，谈何契约精神？主子为钱发愁，这叫主忧臣辱，奴才自当将家财献上为主分忧。退一步说，就算钱是“借”的，奴才何敢要利息？如果主子连本金都还不上，臣子敢催债让皇上难堪吗？那可就用上“主辱臣死”这句话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结果，清政府想效法英、美发行的国债异化为强制捐献和变相“卖官”，结果是一地鸡毛。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赔款的巨大压力下，仓促发行首轮国债。而且自作聪明地给予认购一万两以上者封赐虚衔，最后只筹到1000多万两银子。四年后，又发行一亿两十年期国债，自亲王以下纷纷“认捐”表示效忠，得到破格提拔者不计其数。这也罢了，官员们不仅自己“捐”钱，还为捞取“政绩”在治下大行摊派、勒索，搞得民怨沸腾。折腾了半天还是只筹到白银1000多万两。可见，清政府不是不想借，而是没法借。后来，清政府倒是从西方列强那里借了不少债。但人家一不是你的奴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将本求利；二用你的海关收入做抵押；三有坚船利炮为依托不怕你赖账。所以说，自由、平等、尊

重私人财产的社会环境是发展金融的基础条件。

战败赔款造成的通货紧缩进一步伤害了中国本已脆弱的经济肌体。既然发行国债行不通，清政府为何不像格林斯潘那样发行纸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不是宋朝时就在中国出现了吗？其中的道理与国债难以发行是一样的。如果纸币由政府发行，持有者就是发行者的债权人并且有权力随时要求兑换贵金属（币）。拿着钱庄的银票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兑换，拿着皇上发的纸币，要求兑换金、银，官府不给兑换怎么办？其实，中国人不仅发明了纸币，而且迅速进入纸币的高级阶段——信用货币。宋朝政府滥发纸币的力度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谁说中国人只会发明火药和饺子？中国人在金融方面的创新能力也冠绝全世界。但在封建专制下，金融创新如果没有胎死腹中，就只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损害与动荡。

说到清朝末年的中国金融倒也出现过局部的“繁荣”，那就是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盛极一时。但因清政府根本无力监管，白白让洋人从本来就不富裕的中国抽走数千万两白银，投入什么“南洋橡胶园”之类的鬼生意。

所以说，金融体系的不健全是封建专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英、法皇权衰落，美国根本没有皇权，所以金融业才能发展起来。而在封建专制下，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发达的金融体系。英、美政府不是因为借了钱而低声下气，而是因为低声下气才借得到钱，亚洲诸国不是因为金融不发达而专制，而是因为专制发展不了金融。金融的力量不小，但制度的力量更大！

二、缺乏科学精神是原因吗

还有一种流传更广、流传时间更久的说法：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其实，在人类探索科学真理的早期，不仅“科

学”与“技术”无法区分，就连“科学”与“迷信”也常常混为一谈。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理后认为是神授，斩百头牛祭祀，故该定理又称“百牛定理”。更有甚者，毕达哥拉斯学派具有极为浓厚的神秘宗教色彩，门徒要宣誓守秘并终身不能背叛师祖。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学生希帕索斯发现了无理数，打破了老师“宇宙万物皆为整数与整数之比”的信条，居然因此丢掉了性命！毕达哥拉斯的“科学精神”何在？

中国在商代就发现“勾三、股四、弦五”。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不是有理数”时的惊慌失措不同，中国人坦然地接受了那些“开不尽”的无理数。三国时代的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中提出无理数的概念（作者称之为“面”）：“若开方不尽者，为不可开。”虽然没有严格证明更没有进一步形成系统的理论，但说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科学精神”比中国刘徽强就很可笑了。刘徽怎么说也是位可敬的学者，毕达哥拉斯在今天足以被定性为“邪教”。拿个勾股定理装神弄鬼，又是杀牛又是杀人，还不够邪吗？

科学与技术都源自人类的创造力。技术常常是冰山之一角，科学则是海平面下巨大的山体。没人会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只用技术，背后没有科学做基础。每个民族创造力的侧重点或许有些差别，比如日本可以造出世界一流的电器和汽车，但除了方便面几乎没有发明任何一种全新的产品，在基础科学方面的建树更是远逊于美国。当然，日本人在模仿的基础上实现品质上的超越和资源的节约也是了不起的创造。比如录像机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早期的录像机要100万美元一套，连规模不大的电视台都买不起。后来，日本人匪夷所思地造出成本只有几千美元的录像机，并且价格还一再压低。真正做到了“把电器卖得像水一样便宜”。

中国人可以说兼具美国和日本的长处。李冰父子修“都江堰”不

可能没有几何、流体力学、工程学等深厚、完备的科学知识为基础。而且这些科学知识肯定是中国人原创，绝非从欧几里得和毕达哥拉斯那里“泊来”！近十年来，越来越惊人的“中国价格”，即使剔除劳动力成本超低这个因素，仍然可以让日本人望尘莫及。

对中国科学素质最极端的误解在医学领域，认为中医根本不是科学，完全是些散乱的经验 and 玄学的胡说八道。废除中医教学，禁止中医疗法的呼声起起落落从未完全消散。暂且不说“新文化运动”时期也不说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新千年还出现过一轮贬损中医的声浪。

那么西方人自古以来享受了什么优于中国人的、“科学”的医疗待遇呢？放血，曾被西方当做包治百病的疗法施行了三千多年，到19世纪仍然盛行。甚至到20世纪还被用于治疗肺炎！西方的理发店一般兼营放血，沾血的布条被挂在门口做幌子，今天发廊门口的霓虹灯就是血布条的“升级版”。英语中“理发店”（Barbershop中“bar”这个词根是“彩色旗帜”的意思，无疑指代着血染的布条）这个词还留有“血腥”。失血使人感到虚弱、昏昏欲睡，除了心理作用之外还迫使病人卧床静养，如能康复完全是因为命大。在多数情况下放血相当于谋杀，帝王将相也无从幸免。法国皇帝路易十五放干身上的血仍然死于天花，华盛顿仅因为喉咙微痛先后被随从、私人医生和“国宝级名医”放掉身体里一半的血！两千多年前的关羽身中毒箭能接受“刮骨疗毒”，还享用口服麻药“麻沸散”。如果说华佗神迹有夸大的成分，那普通的乡间郎中依《汤头歌诀》治个头痛脑热还是不成问题的，甚至牛马有疾也能得到有效的医治。也就是说，在19世纪之前的数千年间，西方人“享受”的“医疗”水准，包括法国君主、美国国父，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平民百姓！

可以说，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三、宗教信仰是原因吗

对落后挨打最“深刻”的反思认为中国缺乏“好的”宗教信仰，连今天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其实，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位康圣人明白中国不可能立基督教为国教。于是，他试图力挺儒家思想为宗教以改良社会。当时儒家思想正饱受质疑，康有为的倒行逆施几乎让自己身败名裂，不合时宜的拔高令“孔孟之道”倍加蒙羞。本想将孔子神化的康有为，却诱发了儒家思想近一个世纪的“被垃圾”。

工商文明与宗教的渊源的确极深，但却不像精英们想象得那么“浪漫”。

天下的政府与各自管辖的民众总是匹配的，否则迟早会被推翻，正所谓“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古今中外的政体都是人民的选择，即便是独裁专制政体也是如此。比如封建专制，皇帝不过是个“孤家寡人”，凭什么发号施令？都不听他的不就完了！希特勒不过是个奥地利小个子，“元首”的权威从何谈起？

不同种族的确存在个性差异，但政治体制选择的主要依据还是经济基础。亚里士多德曾夸口：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而不起来叛乱。但在他去世近两千年后，托马斯·费尔默在1680年发表的《族长制》中仍然坚信“帝王的神权”是“自然的权利”，“可以支配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与中国的“君权神授”论有多大区别？照这条路走下去，当然不可能孕育出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与费尔默的奴颜婢膝相比，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奴性何在？

可以这样说，“君权神授”与“天赋人权”两种选择都曾摆在东

方人和西方人面前，决定最终结果的还是经济基础。欧洲以游牧为主的自然经济模式与中国的纯农耕模式不同。游牧民族流动着追逐水草，产品交换发达。就社会整体而言，贸易、远航、探险与征服都是必需的。游牧民族的君主专制从根本上缺乏牢固的政治、经济及物质基础。所以，欧洲的君王们对宗教的借重远胜于中国皇帝。当一部分民众“先富起来”以后，不甘心受制于人，便也从宗教角度寻求“维权”的理论依据。基督教原本就是“穷人的宗教”，诞生千年以后又被“修正”出这样的教义：上帝指给你致富之道（上帝当然不会让你伤害自己或其他人的灵魂），不遵从就是拒绝做上帝的仆人。既然是“奉旨发财”，当然可以享有财富，君王无权干涉上帝的赐予！压迫者（指不开明的君王）是反上帝的，是恶魔的代理人……托马斯·费尔默洞若观火地写到：

“人生来就有天赋的自由，不该受任何压制，并且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任何一个人统治其他人的权力，最终要根据群众的意见来授与……”这种说法因豪爽地把自由给予最微贱的人而被到处热切地欢迎。这些理论首先在神学院产生，后来受到教皇拥护者的纵容……那帮阴险的神学家，一心要把国王置于教皇之下。他们认为最妥当的办法是把人民提高到国王之上。

国王在民众之下，而教会在民众之上，国王不就是教会的“孙子”了！？费尔默的阴谋论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观念的确是神权为对抗君权而最早被提出来的。让无数精英羡慕的“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确实源于宗教，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名论点是：清教徒思想（Protestantism）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2年，800位实业家在美国费城集会后发表一项共识：“我们的忠心首先是对上帝，其次是对合众

国。我们的国家的建立，是对造物主信仰的表现。”利用神权“克”掉君权后，资本的权利（也就是以出资比例为分享利润份额的主要依据）并没有立即树立起来。“食利者”的典型形象就是《威尼斯商人》中那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在亚当·斯密时代，对雇主与工人、利润与工资是不加区别的。辛勤劳动是为了赎亚当与夏娃的罪，不劳而获、奢侈享受都是违背上帝意志的。资本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年间发生的事。

上帝连吃利息都不允许，发达的金融市场怎么会有他老人家的功劳？不是基督教孕育了工商文明，而是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其在思想界的代言人，如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让·加尔文，修正了基督教义。

我们不去讨论宗教信仰的狭义定义，而从广义上讲信仰是无处不在的。如果你身在北京，一个刚由重庆飞来的人告诉你重庆在下雨。如果你上网核实，或者打电话问身在重庆的朋友，那么你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情。反之，你直接相信了，这就是信仰！比如，母亲坚信儿子聪明过人，成绩不好是因为贪玩、粗心，曲折坎坷皆因运气不好。又如，西方国家在儿童中调查“谁是你最敬佩的人”，答案无一例外都是父亲。难道那些半大孩子不知道比尔·盖茨比当卡车司机的父亲富有？奥巴马比当小职员的父亲权力大？人的精神世界里有许多这种不需求证也无法求证的东西，先验地被信以为真，这些都可以在广义上称为信仰。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的核心就是通过信仰而得救。他说“任何事都依赖于信心。如果一个人必须穿越海洋，却不相信舟船能将他送达彼岸，只能待在原地，永远不能得救”。总之，信仰是人生脱离不开、却得不到理性充分支撑的那些信条。比如今天的人出行经常乘坐飞机，从绝对理性角度来说是不安全的，但大家认为“不会那么巧……”这与马丁·路德那个乘船渡海的比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